

女性主义是否需要“形而上学”？

——基于萨利·哈斯兰格理论的思考

肖 巍

关键词：女性主义；形而上学；萨利·哈斯兰格

DOI: 10.13277/j.cnki.jcwu.2016.05.017

收稿日期：2016-06-19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6)05-0108-05

作者简介：肖 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性别哲学、生命伦理学。10008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伦理学思想史的女性主义解读”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AZX011。

在当代女性主义哲学家中，麻省理工学院的萨利·哈斯兰格(Sally Haslanger)教授对于“形而上学”问题的探讨颇具代表性。她有两篇文章引人深思：一篇是被《剑桥女性主义哲学指南》收入的《形而上学中的女性主义：与本性的谈判》，对一些困惑人们许久的性别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和阐释。另一篇是2016年7月，她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召开的“国际妇女哲学家第16届论坛”上所做的主题发言——《意识形态 and 知识关乎什么》，这篇文章对女性生育权利问题进行了形而上学分析。因而，我很想把这两篇文章结合起来阅读，顺着她的思路思考女性主义形而上学问题，梳理一些概念上的迷惑和混乱，从而探讨女性主义哲学是否需要形而上学，以及如何运用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分析工具等问题。

一、女性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关联

在当代哲学中，有一种倾向试图否定形而上学的作用和意义，例如逻辑实证主义宣布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也导致一些女性主义哲学家对形而上学展开批评。这道理似乎也很明白：女性主义是有着明确政治和道德诉求的社会运动，而形而上学却在追求对世界及其组成部分进行不掺杂人为意图的客观解释，这两者显然是自相矛盾

的。对于后者来说，“现实就是现实，形而上学的目的应当揭示现实是什么，而不是我们为这一现实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价值”。^{[1][10]}退一步说，即便我们承认女性主义需要形而上学，那么，女性主义研究可以为形而上学保留空间吗？女性主义能为形而上学做出贡献吗？说到这里，我们还应当对“形而上学”做出界定。这是一个哲学研究者熟烂于心的概念，有多种多样的解释，或宽泛，或狭义。2013年，我在完成“女性主义形而上学研究中的两个热点问题”一文时^[2]，对“形而上学”的理解颇为宽泛，认为它主要研究本体论和认识论，不仅研究人与世界的本质，关乎我们自身和世界的基本概念，以及为了这些研究所进行的各种假设，即本体论问题，也研究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与方法，即认识论问题。依据哈斯兰格的解释，形而上学研究主要有三个部分：“1. 关于存在或者什么是真实的研究，这一领域被称为本体论，例如精神与身体不同吗？除了物质对象之外，世界具有某些属性、自然性、普遍性和本质吗？2. 研究用来理解我们自身和世界的基本概念，例如存在、预言、身份、因果关系以及必然性。3. 研究进行探讨的前提，或者第一原则。”^{[1][107]}事实上，女性主义学者对于是否应当，以及如何探讨女性主义形而上学问题其说不一。哈斯兰格总

结说,这是因为一些人认为形而上学一直是由男性主导的,故此应倡导一种更少男性偏见的形而上学理论。另一些人却主张女性主义有充分理由拒绝形而上学,而哈斯兰格却对形而上学持一种审慎的改良态度。哈斯兰格观察到,社会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诸如性暴力、生育权利,以及同工不同酬等问题背后都有形而上学理论作为支撑。正是由于“男性中心论”(Androcentrism)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假设阻止某些观点被听到,或被认真对待”,社会才以体制形式为这些行为提供支持,至少有一些科学和哲学具有性别歧视倾向。“性别歧视理论假定女性劣于男性,断言女性的从属地位是好的或者适当的,或推荐一种性别刻板模式,这在哲学中从未缺席过。”^{[11]109} 不过,哈斯兰格不赞同以“女性中心论”(Gynocentrism)来替代男性中心论,因为个体、种族、阶级以及历史时代是不同的,因而很难形成一种普遍的女性中心论视角。女性主义科学家哈丁认为,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更有特权认识客观真实性,但哈斯兰格却认为根本不存在这种纯粹的客观真实性(Real),因为人们的思考都是以文化为前提条件的,没有人能够发现什么是纯粹的客观真实性。倘若我们坚持认为“女性中心论”更可取,那也不是因为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更有特权认识到这种客观真实性,而是基于对其他美德——或认识上的,或政治美德的强调。

哈斯兰格还探讨了一个重要的女性主义认识论问题——“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如果女性主义试图研究形而上学,便要考虑如何着手,也就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认识论一直在这里扮演重要的角色,人们通常都是通过认识论来分析基本概念和发现存在范畴的。理所当然地,形而上学研究要反映出有广泛影响的认识论,因而在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认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它也势必在形而上学研究中起到主导作用。哈斯兰格界定说,基础主义是一种哲学观点,主张信念只能通过自身的确定性,或者某些具有确定性的前提来证明。然而,语言哲学的问世却打破了这种追求确定性的魔咒,因为语言被视为一种工具,人们必须通过它来获得关于存在的知识,语言的能动性和多样化使得被分析的“真理”无法具有确定性。“在后奎因时代的形而上学争论中,人们一直拒绝那种为了提出具

有合法性的本体论主张,我们可能拥有或需要确定性,抑或需要直接把握真实性的想法。”^{[11]113} 显然,女性主义也需要批评这种追求确定性的基础主义。也许形而上学根本就不是一个基础项目,让我们能基于一些有自明性的前提来建构知识大厦。既然在女性主义看来,形而上学并不能发现纯粹的客观真实性,基础主义也无法得到所期待的那种确定性,那么人们便有权利对探讨形而上学的认识论方法和出发点进行政治和道德追问,看它们是否具有偏见,看被它们视为具有“纯粹客观真实性的”、“自明的”、“本性的”和“自然的”前提和假设究竟要服务于何种社会目的。当然,在这一批评过程中,女性主义者也不能以“女性中心论”来替代“男性中心论”,而要坚持反对和消除包括性别压迫在内的所有压迫的女性主义主张。哈斯兰格认为,女性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关联有两个路径:其一,要把女性主义道德和政治理论,以及认识论安顿在形而上学中;其二,应当用女性主义的文化和历史见地来消解以往形而上学布下的种种迷局。

在建构对于世界的解释框架时,以往的形而上学还关注心灵/精神与物质世界的关系问题,提出心灵/精神对物质世界参与的程度如何?是否有一个不依赖于我们意志为转移的世界?我们能在哪一个“交叉点”上捕捉到这个世界,并使其理论化的问题?女性主义在对性别、种族、身体等问题进行形而上学探讨问题时,也会遇到类似的徘徊和困惑,经常感觉在解释方面词不达意和捉襟见肘。哈斯兰格指出,一些在当代人看起来是“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观点,实际上是用所谓的“客观事实”和“自然本性”来掩盖价值观的作用。那些对于有色人种和女性就“自然本性”而言是“不同的”或者“劣等的”解释,实际上是社会力量所致。她还继续追问道:“是否在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有意义的,并在政治上可行的区分?如果有,这一分界线划分在何处?有什么方式可以把不依赖于我们政治偏见投射的自然理论化吗?如果有,该如何进行?”^{[11]116} 女性主义在谈论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时,似乎很容易遇到一个理论困惑,不知如何解释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关联,以及关联的程度问题?这一问题,实际上也是心灵/精神与物质世界关系问题的翻版。因为心灵/精神显然是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物质

也可以理解为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哈斯兰格同意巴特勒的看法,认为自然、性别和种族都不是一种给予,而是一种建构,“一种基于社会性别范畴的建构”。这并非意味着,她意图消除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区分,而是说一旦我们进入哲学讨论中,这些研究对象便成为“概念”,而不再有可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性别和种族。许多人可能依旧迷茫:如果摆脱男性中心论,究竟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和身体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参与了社会性别建构?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十分困惑的难题,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即便有一天生命科学或者人文社会发展能够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一问题,所使用的也一定是可变的 历史和文化话语。

哈斯兰格认为,许多哲学家都企图像科学家一样追求永恒不变的真理、纯粹的客观真实性和确定性,传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也一直在竭尽全力地获得真理性认识。然而,在女性主义看来,“个人都是政治的”。哲学也不可能是中立的,所有被宣布为“绝对真理”的东西都被打上了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烙印。既然如此,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哲学不需要为了概念而研究概念,把概念当成一种工具来研究吗?不能像 20 世纪初摩尔的“元伦理学”那样,仅仅研究“善”和“正当”范畴本身的属性和本质,而不冠以任何实质内容吗?当然可以,如同我们组装家具需要螺丝、钳子和锤子一样,这种元伦理学意义上的“善”与“正当”就是哲学的螺丝、钳子和锤子,但哲学不能也不止如此,否则便成为一种动手或者动脑的游戏,人们最终需要的还是“家具”和能够推动历史和社会进步的那种有实质内容的哲学。在哲学领域,经常听到一些纯粹形而上学的追求者议论说:“女性主义哲学不是哲学,或者仅仅是对于哲学的应用。”眼下,我们也无法对此做出有力的回应,因为就连影响世界的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思·巴特勒都认为自己是哲学圈外的人,但我们还是可以用一种粗笨的方法观察这些纯粹形而上学追求者所研究的哲学。他们中有人着迷于逻辑——如同我们前面说的作为哲学工具的螺丝、钳子和锤子,也有人研究从古希腊到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哲学。我们不禁想多问几句:那些哲学“工具”便足以成为哲学研究的目的吗?那些经典哲学家的哲学就不是时代和

历史的产物了吗?今人的解说就不体现当代人的理解,具有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吗?退一步说,有谁说女性主义哲学要抛弃这些哲学“工具”和那些经典哲学家了?相反,工具是必要的。经典哲学家的光辉思想也是女性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总而言之,在每一个被文化、语言和意识形态纠缠的人类社会里,那种对于“纯粹的客观真实性”和“确定性”、“自然本性”,以及“绝对真理性”的追求,似乎已成为追梦人的一种永远都化不开的乡愁。女性主义需要形而上学,并把自己的价值追求带入其中。

二、女性主义如何运用形而上学分析工具?

女性主义需要形而上学,尽管这种形而上学与以往是不同的。这里的重要差异或许是它相信形而上学的政治性、道德性、社会性和历史性,而不是把它视为纯粹的客观真实性或绝对真理。可以说,如果没有形而上学,也就没有女性主义哲学,或者说无法进行女性主义哲学分析。那么,女性主义如何运用形而上学这一分析工具呢?哈斯兰格新近的研究成果可以提供一个参考。

在 2016 年 7 月“国际妇女哲学家第 16 届论坛”上,哈斯兰格以《意识形态 and 知识关乎什么》为题发言,从分析 2013 年美国发表的一份文献入手介绍自己的研究。这份文件揭露了在 1973 年至 2005 年间,美国有 413 例怀孕女性由于被拘捕或者强迫性医疗干预被剥夺生育权的情况,其中种族女性占居多数。有 3/4 的女性有资格进行贫困辩护,但文献提及只有 23% 女性的家人运用了这一权利。哈斯兰格看到,近年来,美国社会颁布了一些旨在保护怀孕女性免受家庭暴力的“堕杀胎儿”(Feticide)的刑法。然而事与愿违,这些刑法转而却把矛头指向怀孕女性,例如所谓的吸毒、酗酒和不遵循医嘱便可以成为逮捕、拘留和对怀孕女性实施强迫医疗干预的理由。尽管国家并没有以法律认定吸毒女性继续怀孕是一种犯罪行为,也没有通过法律让她们对自己这样做的结果负责,同样也没有修订“儿童虐待法”,使之适用于怀孕女性与自己所孕育的卵子、胎儿和婴儿的关系。哈斯兰格毫不怀疑处理这一案件的郡治安官、法官、警察、医疗机构和陪审团成员具有性别和种族歧视,以及阶级歧视(Classist)倾向,强调

这些看上去只是女性生育管理问题,实质上却反映出由意识形态来维系的社会关系结构。

也许有人会做出这样的解释:这些郡治安官、法官和警察等人也是出于善意,只不过在对法律认知上有一个误区,担心怀孕女性的健康,也担心毒品使用对于胎儿的伤害,正是这种认识错误导致他们侵犯女性的法律和道德权利。然而,在哈斯兰格看来,这种在“保护”名义之下对于女性权利的侵犯却反映出意识形态中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社会的而非个人的行为。意识形态提供一个工具,用于形成和理解被扭曲的认识方式,它与使一种特权和主宰方式得以稳定的实践思维及其语言密切相关。她借用亚里士多德的“技艺”(Techne)说明意识形态通过什么方式成为指导人们思维和实践的隐秘图式。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活动分成理论、实践和制作,它们分别对应智慧、实践智慧和技艺三种理智能力。制作与技艺的关联不仅表明后者中包括人类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也表明技艺如同制作一样是一种隐秘的思维图式。因此,哈斯兰格强调:“依我之见,意识形态提供一种文化技艺,一系列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共意义、脚本、思维和推理方式,它们通常指引我们不自觉地参与和维持不公正”。^①在一种文化技艺引导下,人们会认可一种解释和行为方式,参与本地区体现共同价值观的实践活动,从而也形成促进相关行为的社会环境。尽管许多社会实践是良性的,但人们也能在那些不公正的或者有害的社会实践中随波逐流,而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或者这些群体性行为会产生什么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文化技艺也形成一种认知障碍,让人难以理解主宰结构是如何起作用的。而且,这不仅仅是一种认知障碍,因为它影响到我们知觉和信念的形成,也影响到我们的情感、意动和享乐的状态和过程,以及身体倾向等等。总之,意识形态指明了我们与世界交往的实践方向。也正因为如此,那些郡治安官等人才会对种族和贫困女性的权利要求视而不见。哈斯兰格指出,他们的错误在于无视怀孕女性的体验和选择,意识不到她们的存在和价值。在男性主

导的美国社会,女性的价值通常都是由她们在男性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女性完成这些角色的意愿和能力决定的。郡治安官、法官和警察等人并不是没有听到这些女性抵抗的哭喊声,但他们无法理解这些声音,而这并不是个别事件,而是人们所普遍相信的东西。哈斯兰格强调说:“我在这里讲的是产生并维持这类压迫性行为方式的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文化模式。”正是“文化技艺通过选择、关注和记忆形成了我们的体验”。如果我们与社会世界打交道,在不考虑行为本身所关涉的道德意义情况下,就有可能如同郡治安官等人一样在选择和行为方面犯错误。“意识形态从制度上阻止我们意识到那种通过塑造和过滤体验形成的,旨在加强主宰结构的实践本身与道德的某种关联。”^①仔细想来,哈斯兰格的这一思想是极为深刻的。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先于并外在于个体的存在,也就是哈斯兰格所说的一种文化“技艺”,它无论作为一种隐性还是显性的思维模式都是被塑造出来的。在这一塑造过程中,必然要过滤掉许多与主宰者观念和体验相左或不同的体验和符号。在人们已经接受并把一种意识形态当成实践方式时,便会不由自主地做出与被这种意识形态排除者不同的选择。倘若在这时,人们还没有意图返回原点去思考这种意识形态及其相关社会行为的道德意义,那么势必会忽视那些被主宰者的哭喊声,因为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体验已经注入了证明这类不道德行为具有“合理性”的文化技艺。

因而,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上做出道德选择和判断始终是问题的关键。哈斯兰格争辩说,只要文化技艺在促使和维持不公正社会结构和倾斜的价值观,它就是意识形态性的。这里,我们想补充一句说:意识形态也是历史和可变的,它当然也可以体现出一种公正的社会结构和正确的价值观。哈斯兰格也要求人们意识到道德知识、价值观和推理本身都是由社会建构的实践活动。归根结底,女性主义对于那些郡治安官、法官和警察等人的批评不能寄希望于他们人性的自我觉醒,而需要改变社会的文化技艺,重构它们的社

^① 参见萨利·哈斯兰格(Sally Haslanger)教授于2016年7月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召开的“国际妇女哲学家第16届论坛”(The 16th Symposium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men Philosophers)上所做的主题发言——《意识形态和知识关乎什么》(Ideology and Knowledge of What Matters)。

会实践指向。那么,我们又基于什么来挑战现有的主宰文化技艺,让其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呢?显而易见,仅凭理性的自我利益协调是不够的,因为那些既得利益者或主宰者不会轻易地放弃有利于自我的文化技艺。所以,我们与哈斯兰格一样需要共同面对一个难题:如果人们无法在公正的问题上达成一致,那么要用来证明我们的努力是正确的?还有,即便我们是正确的,那些既得利益者或主宰者会接受这种正确性,并相应地行动起来吗?哈斯兰格并不悲观,主张应当与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们团结起来,让社会发生改变。我认为,这也是女性主义和向往社会公正者的共同追求。因为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有希望变得更美好。

三、余论:女性主义需要形而上学

关于女性主义和形而上学,还需要思考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女性主义需要形而上学,也把自己的价值追求带入其中。第二,女性主义在认识和解释世界、自我,以及权利诉求时,需要使用形而上学的“概念”或者“范畴”。第三,女性主义的名言是

“个人都是政治的”,强调要重视女性在不同境遇中的体验和经历。然而女性的个体体验还不能算作是哲学,因为只有带有普遍统一性的东西才能构成哲学的概念加以讨论,因而女性主义学术研究需要提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来进行。第四,既然哲学不是中立的,女性主义不仅需要从哲学上解说女性、理性、感性、精神、身体,以及公正、自主性、权利、自然和空间等概念,也应当不断地提出新概念,因为每一个概念的提出都对应着一个或一些亟待需要解决的社会或理论问题。第五,女性主义在试图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伦理分歧和道德矛盾时,首先需要澄清道德概念,分析道德的逻辑和推理。第六,女性主义学术的发展也需要形而上学来架构、检验、证明,以及矫正学术研究的前提,女性主义形而上学与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差异性”便是女性主义对形而上学做出的贡献。

女性主义与形而上学的结合尚还是一个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新课题。尽管我们无法预测这种结合的走向,但却能够断定它会越发地引人注目,并可以带领人们体验到意想不到的哲学风景和进入一个崭新的新社会。

【参考文献】

- [1] Sally Haslanger. *Feminism in Metaphysics: Negotiating the Natural*[A]. Miranda Fricker and Jennifer Hornsb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eminism in Philosophy*[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 肖巍.女性主义形而上学研究中的两个热点问题[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4).

责任编辑:杨 春

Does Feminism Need Metaphysics?

——On the Theory of Sally Haslanger

XIAO Wei

Key words: feminist; metaphysics; Sally Haslanger